

论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

臧 宏

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系

摘要：本文对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共讲四个问题：一、世界哲学的涵义，认为世界哲学主要是指东西方不同民族哲学的沟通与合流。二、世界哲学的开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世界哲学的开始。三、“智慧说”中的世界哲学思想，认为冯契的“智慧说”堪称是形成过程中的世界哲学的一个范例。四、如何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只要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哲学家的队伍，就能够使 21 世纪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冯契；胡适；中西哲学合流；世界哲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冯契就不断地提出世界哲学问题来讨论，并对之作了多方面的阐释；而经过十年之久，即到 he 逝世的时候，其世界哲学思想，便已初具规模，接近成熟了。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是和他的“智慧说”的体系密切联系着的，可以说是他的“智慧说”的融合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哲学思想的这一主要特点的展开和表现；认真地研究它，对于加深对智慧说的理解，促进 21 世纪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合流，推动 21 世纪中国哲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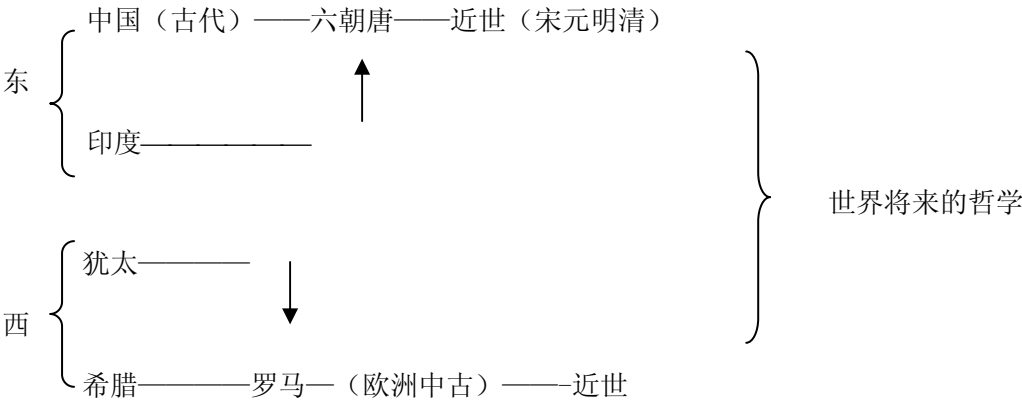
一、世界哲学的涵义

什么是世界哲学？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看冯契对胡适的世界哲学思想的评述。冯契说：“经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旧思潮之自由争鸣，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思想家们力求深入到哲学的层次上来说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关系问题。胡适在 1919 年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说：‘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中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在西方，后来犹太系加入希腊系，经欧洲中世纪，发展到近代而大盛。在东方，在六朝隋唐时期，印度系加入中国系，后发展出宋学和清代汉学。胡适说：‘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胡适这种说法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虽然别人不一定完全赞同（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人生态度不同把文化分为西洋、中国和印度三个类型，等），但认为应从世界哲学史的高度来比较研究各国的文化，以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则是许多学者、思想家的共同看法。”（《智慧的探索》，第 539—540 页）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胡适是最早提出世界哲学观念的中国人（外国的马克思也提出过此观念）。他提出这一观念，与“古今中西”问题密切相关。大家知道，就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关系来说，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提出了比较通达的见解。他明确主张中西文化汇合论，认为只有把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内在地联结起来，才能建立我们的新文化。如果那西方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强加于中国的，中国人总是感到不自在。所以，重要的是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到那“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就哲学来说，胡适以为，通过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而在先秦的“非儒学派”（墨家、名家等）中，“可望找到移植

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先秦名学史·导论》）这是他写《先秦名学史》的指导思想。后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又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胡适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中国的新哲学”；因为他在对于古今中西的态度上，后来走上了“赞成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他提出“中国的新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新贡献；因为这个概念，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是中西“两大潮流汇合”的结果，它与“世界哲学”这个概念具有同一意义。

这段话包含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世界哲学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传统的哲学的沟通和合流。用胡适的话来说，一是东方哲学中的印度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沟通和合流，结果是“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二是西方哲学中的犹太教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沟通和合流，结果是“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三是东方与西方“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在“五十年后”或“一百年后”，可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冯契发挥了胡适的这个观点，说：“所谓世界哲学，是在东西方各民族的哲学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经过比较而彼此会通的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的探索》，第 598 页）胡适为了使人更清楚地了解他的“世界哲学”的涵义，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在讲完“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之后，还专门附了一个“世界哲学统系图”，供读者仔细研究。现将此图移录于后：



在这个表中，胡适向我们强调了两点：一是他所说的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哲学的沟通和合流，主要是指东西方两大哲学系统的沟通和合流；二是他所说的世界哲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东西“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应当主要理解为东西方哲学的沟通和合流的“产物”或“结果”；表中所说的“世界将来的哲学”，就是这种“产物”或“结果”，它是既不同于东方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种崭新的哲理境界或哲学学说。冯契有时把胡适所说的“世界将来的哲学”或“世界的哲学”，称为“世界的新哲学”。他说：“新时代需要新哲学，而世界的新哲学可能在东西两大文化传统的冲撞和互相作用中孕育出来。”（《智慧的探索》，第 540 页）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冯契同样是把世界哲学当作是东西方哲学沟通与合流的产物来看的；因为他所说的“孕育出来”，就是“产生出来”的意思，亦即是“产物”的意思。

这段话包含的第三层意思，是说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用冯契的话说，“无疑，新时代的哲学或胡适所说的‘世界的哲学’的建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上书，第 541 页）用胡适的话说，“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哲

学相结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成是世界哲学的开端；如果把冯契的“智慧说”体系看成是世界哲学形成中的一个范例；如果能培养出类似唐代玄奘那样的哲学家，把大量的外国第一流哲学家的哲学著作翻译过来；如果在 21 世纪初，中国哲学能作自我批判和系统的反思，进而会通古今中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那么胡适的预言，就会由可能变成现实，一个适合于新时代需要的世界的新哲学就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总观上述的三层意思，世界哲学的涵义则昭然若揭：世界哲学的观念，是为了说明和解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的关系（之争）而提出来的；它是东西方各民族的哲学的相互沟通和彼此合流的结果，是经过比较、通变、中介、扬长弃短等方法（下面将详述）形成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标志着各民族的精神财富已由民族分享的发展成为世界共有的；它是民族化的和个性化的世界文化的灵魂或核心。

二、世界哲学的开端

世界哲学的形成，固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它的开端却不是遥遥无期的。冯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看成是世界哲学开始的一个标志。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的结合标志着世界哲学的开端。”（《冯契文集》，第 10 卷，第 247 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西方，西方哲学，在 20 世纪已与东方哲学沟通和合流，成为世界哲学的基本构成部分；“中国传统”（主要指传统哲学），在 20 世纪也开始与西方哲学沟通和合流，成为世界哲学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哲学的开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世界哲学的开端，冯契还说了如下一段话：“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本来各自独立发展着，中国古代哲学史很少受外来影响，受了一点印度影响，但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传统加以吸收，把它消化了。但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都遵循共同规律、都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相结合）阶段、近代机械唯物主义阶段、到达了辩证唯物主义阶段。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标志着东方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汇成统一的世界哲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中国与西方哲学史统一、合流的过程。这个流是怎么合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应该看到现代已有了统一的世界哲学史，毛泽东哲学著作具有世界意义、世界影响，大家都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先进的科学。”（《冯契文集》，第 9 卷，第 529—530 页）这段话，具体地点明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著作”是世界哲学的开端，是世界哲学史开始的标志。其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著作，不是西方的任何一种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高级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这里的“中国革命实践”，又是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既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著作，是西方哲学中最高水平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优秀的成果相结合，那么，它作为世界哲学的开端，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段话，还特意讲到“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中国与西方哲学史统一、合流的过程”，这也是在告诉我们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世界哲学的开端。因为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一部哲学革命的历史；他为此写的专著，其书名就叫做《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他把这个哲学革命分为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阶段。认为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它以近代的科学（首先是生物学）为根据。在自然观上，它是唯物论的。它把人类社会看作为自然发展的产物，看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也是合理的见解。当时一些革命者以进化论作武器，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历史演变，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他们把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或者归之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归之于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的互助合作。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的进化，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在哲学上，也就不能成为世界哲学的开端；尽

管它已经中国化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绪论》）。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则不同。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辩证唯物主义，它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最重大的成果。这个成果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我国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一种现代的提升，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世界哲学思想，将它看成是世界哲学的开端，应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冯契的下面一段话，也值得我们重视。他说：“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中国土地上已开始汇合（当然仅仅是开始），这不仅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表现在某些专业哲学家尝试建立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今后也还会如此，中国土地上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中西哲学的结合，结合得好的，便有生命力，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冯契文集》，第7卷，第722页）这段话是强调，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世界哲学的开端外，冯契还认为某些专业哲学家所建立的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也是世界哲学开端的表現。所谓“某些专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哲学家。就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专业哲学家而言，如熊十力提出的“翕辟成变”和“性修不二”的学说，金岳霖提出的“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和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命题一样，都是世界哲学开端的一种标志。最饶有兴味的，是“今后也还会如此……”那段话；它希望有更多的、能够成为世界哲学开端的、富有生命力、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的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出现。我以为，这样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它就是冯契的“智慧说”体系。

三、“智慧说”中的世界哲学思想

在作为世界哲学开端的许多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中，我认为冯契的“智慧说”体系，到目前为止，算是最典型的一个，堪称是世界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范例。

冯契的“智慧说”，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但从哲学理论上对之作集中论述的，还是他自己说的《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三部著作虽各有主旨，但又有共同点，它们都善于会通古今中西，都是世界哲学思想的一种展现。

先看《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是“智慧说”的主干。其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也就是在讨论广义认识论问题，亦即关于天与人、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统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冯契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从历史上作了广泛的考察，对有关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选择。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天与人的交互作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统一。”（《冯契文集》，第1卷，第91页）他特别重视传统哲学的这一特色，认为王夫之的如下的观点：“色声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尚书引文·顾命》），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王夫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和人、性和天道是通过感性活动这个桥梁来互相授受的，正是在这种天和人、性与天道交互作用过程中，才能认识世界（天道、人道）和认识自己（心、性），获得智慧。冯契给王夫之这一思想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充满辩证法光辉的理论”，但他同时也指出：王夫之“讲的通过色声味授受的活动还不是实践，他们辩证法还缺乏实验科学的基础。”（《冯契文集》第1卷，第298页）

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中，冯契最注重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最基本的积极成果。它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这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而实践则可说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正是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科学

地阐明了认识运动的秩序。这一理论揭示了在实践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特色。因此，冯契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的结果。”（《冯契文集》，第7卷，第693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的科学概括”（同上书，第613页）引起冯契注目的再一个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是他的老师金岳霖的“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他认为，这一原理，如果加以引申，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那它也就是把认识了解为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冯契还指出：“金岳霖不仅是在天道观上复活了‘理气’之辩，接上了中国传统；而且他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实在论的基础上阐明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也正是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传统发展的结果。因为从孔、墨、荀子到王夫之、戴震等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主流，正是主张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金岳霖在天道观和认识论两个领域都做了会通中西哲学的工作”（《冯契文集》，第7卷，第561页）金岳霖的这一原理和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都对冯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将它们看成“是从传统哲学到冯契的‘智慧说’重要的中间环节。”（邝柏林：《冯契与中国哲学革命》，《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1）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不论是金岳霖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他们的认识论局限于知识领域。

冯契还直接从传统的西方哲学和现代的西方哲学中，批判地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成为自己“智慧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他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康德的有关“自我”、“感知”——“知性”——“理性”以及理性批判等思想；并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哲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也作了会通和融合。曾经有一位美国哲学家对冯契说，他在冯契的思想中看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冯契认为这位美国哲学家是颇有眼力的（童世俊：《冯契和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德性》，第265页注①）。冯契重视吸取实证主义中的合理因素，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因素，是解决“可爱者”与“可信者”的关系问题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在非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中，冯契尤其重视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个哲学派别。他认为，西方哲学的意志主义在中国既可以起否定性的作用，又可以起肯定性的作用。就否定性的作用而言，它可用来克服由于片面强调理性自觉而导致的宿命论、理性专制主义，以及破除这两者之后所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就肯定性的作用而言，它可用于建立一种把理性和意志统一起来、把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统一起来的哲学。在冯契哲学中也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一些影响。他用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这一对属于存在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并通过这种解释来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向。他非常重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反本质主义，认为，他们的反本质主义，虽然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人”这个具体存在可以而且应该由本质联系起来把握。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克服现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缺点。他说：“马克思是很强调本质与存在的统一的。后来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却把‘存在’丢掉了，有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在中国，不仅受前苏联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且也由于传统儒家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了‘本质’。当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讲普遍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有道理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30年代以来有过分强调阶级、集体而忽视个性、忽视每个人的具体存在的倾向，以至于后来对个性自我采取极粗暴的态度，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冯契文集》，第3卷，第202—203页）

概而言之，冯契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下，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包括古代的与近代的）与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融合贯通起来，提出他的广义的认识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获得有关性与天道的真理性的认识，培养自由人格，体现了他的哲学的世界性的特点，即着眼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的哲学的沟通和合流。他的以广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智慧说”，把科学地认识世界和认识

自己、改变世界和发展自己统一起来，这就为解决近代以来的科学和人生脱节的课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构想，体现了他的哲学的时代性的特点，即把握时代的脉搏、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其实，冯契哲学的上述的两个特点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众所周知，科学和人生脱节的课题，既是重大的时代的课题，又是重大的世界的课题；因为反映科学和人生脱节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不仅存在于近现代的西方，而且存在于近现代的中国，两者的对立同样是世界性的。所以，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会通中西”，与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出发点，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沟通和合流”，是一致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马、中、西哲学的融合”。

次看《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这是“智慧说”的一翼。其主旨在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的思维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换言之，本篇主旨在于讨论逻辑思维及其方法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冯契也是注重发扬民族传统的特色，进一步会通中西。他构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这一理论体系，就是把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并且同西方一些逻辑思想结合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基本逻辑范畴和辩证逻辑的方法上。

在基本逻辑范畴上，冯契作了中西会通。他说：“康德把范畴分成四组，一组关于质的范畴即肯定与否定，我们已经把它作为规律，在讲判断的肯定否定运动时讲过了。剩下的也就是三组范畴：一组是关于个别与一般的范畴，一组是关于因果性联系的范畴，还有一组是关于模态即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范畴。也分别相应于类、故、理的范畴。可见把逻辑范畴分成三组，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共同的观点。”（《冯契文集》，第2卷，第221—222页）冯契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用中国传统的类、故、理作为逻辑范畴的骨架，构成一个崭新的逻辑范畴体系。这显然也是一种古今中西的会通。他指出：“古人既然已提出类、故、理的范畴，说明古人也已经具体而微地把握了逻辑范畴的体系。一个初生的婴儿已经具有成人的雏形，甚至一个胚胎也应该承认它完整地具备了一切发展要素的萌芽。达到发展高级阶段进行批判总结的时候，往往好像是出发点的复归，正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我们用类、故、理作为逻辑范畴的骨架，这好像也是出发点的复归。”（同上）他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理论，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对中国传统逻辑范畴体系作了批判的总结，使之达到了一个成熟的新的阶段。

在讲到辩证思维方法时，冯契也作了古今中西的会通。他把荀子的逻辑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指出辩证逻辑方法最基本的是两条，这就是荀子说的“辨合”与“符验”，即每一步都是矛盾的分析与综合，每一步都要用事实来检验。他还结合列宁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的论述，和通过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考察，概括地提出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一般环节：“第一，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把握事物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从而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第二，用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根本的方法，其核心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而对现实的矛盾的具体分析，要联系到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评论。第三，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第四，历史和逻辑相结合。三、四两条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组成部分。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于不同对象有不同特点。有的科学要着重横的解剖，归纳与演绎统一便成为主要的；有的科学要着重纵的考察，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便成为主要的。第五，每一步都要用事实来检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贯彻于整个过程之中。”紧接着这段话之后，冯契强调地指出：“我们作出这样的概括，既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把中国近代哲学家对方法论探索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包含在其中了。前人提出的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的要求，归纳法、演绎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的精华，已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安置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智慧的探索》，第262—263页）冯契特别申明：他的这一概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和近代的

逻辑和方法论，而且会通了西方一些辩证逻辑的积极成果（如批判地吸取黑格尔关于逻辑方法的三个环节：“开始、进展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上作出的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

冯契如此强调逻辑及其方法论上的古今中西的会通，是因为从传统的逻辑思维看，中国人长于辩证思维，西方人则发展了形式逻辑，中国和西方各有所偏。只有会通中西，才能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更好地发展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他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正趋于合流，将会给哲学（包括逻辑学在内）以崭新的面貌。”（《冯契文集》，第2卷，第21页）冯契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在逻辑理论上既是对古今中西的会通，也是对古今中西的超越，因而与一般的逻辑学教科书不同，确实是一个“崭新的面貌”。

再看《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是“智慧说”的另一翼。其本旨在讲化理论为德性，即在于说明：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也就是在于讨论自由和价值观问题。在这方面，冯契同样是注重发扬民族传统的特色，进一步会通古今中西。他从对中国哲学史上各种价值学说的考察中，概括出了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原则。他说：“趋向自由劳动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哲学史上看，还需正确地解决天人之辩、理欲之辩、群己之辩等。这就是说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原则应该包括：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通过自由劳动（自由的感性活动）的辩证的统一；人的本质力量、即理性与非理性（情意）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集体精神互相促进，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理想目标。”（《智慧的探索》，第652页）这一概括，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古今中西哲学会通的表现。如价值体系的第一个原则——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统一，可以看作是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吸取王夫之的天人交互作用的合理观点，扬弃各执一端的儒道思想后所得出的结论，体现了价值领域中天与人的统一。又如价值体系的第二个原则——理性与非理性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是冯契提出的理性原则和感性原则的统一，要求人的本质与存在的统一，通过对存在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双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代西方哲学，体现了价值领域中理与欲的统一。再如价值体系的第三个原则——群体和个性的统一，冯契在指出群体原则所揭示的人的社会本质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能忽视人的具体存在，这种群体原则和个性原则的统一、人的本质与存在相统一的思想，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价值观变革）、乃至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总结，体现了价值领域中群和己的统一。有人会问：马、恩没有直接论述过价值问题，为何又说古今中西的会通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实现的呢？这并不矛盾。经过与马、恩同时代的西方哲哲学家比较之后，冯契坚定地认为：“马恩关于理想和自由的学说，已为价值论问题提供一把钥匙。”（同上书，第596页）这一论断，是和“趋向自由劳动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础”的论断相一致的，应当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

通过对《智慧说三篇》关于会通古今中西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智慧说”中的世界哲学思想已跃然纸上。它清楚的告诉我们，世界哲学，并非纯粹的观念之物，也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只要胸襟开阔，途径正确，方法得当，在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中，会通古今，融合中西，就能够建立具有世界哲学性质的哲学体系。当然，那种抽象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世界哲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能是那种富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特点的世界哲学。要特别记住：世界哲学是一个过程，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实体。一个具体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哲学体系，只不过是世界哲学的一种表现而已。

四、如何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冯契十分强调要推进中西哲学的合流即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他说：“中西方的文化，

中西方的哲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已开始趋于合流，有待于进一步地推进，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冯契文集》，第7卷，第723页）那么，应当如何推进呢？冯契认为，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二要有恰当的方法，三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哲学家的队伍。

关于态度，冯契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要离开世界哲学的潮流。”（《冯契文集》，第10卷，第247页）“辩证唯物主义要通过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发展自己，要以平等的自由讨论的态度，而不能以‘定于一尊’的态度来对待各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同上书，第7卷，第564页）又说：“同时也要有宽容精神和兼容并蓄的胸怀。”（同上书，第9卷，第565页）这一点，很重要。在今天，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要与外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合流，要使世界哲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必须持这种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指导思想，是中西哲学会通、合流的出发点。

关于方法，冯契首先提出比较法。他说：“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同上书，第722页）有人以为冯契提示了两种比较法，一是宏观的比较考察，一是诠释学的比较考察。认为西方伦理学思想偏重于自愿，中国伦理学思想偏重于自觉，就是一种宏观的比较考察。这种比较好像是一种定向的考察，它表示一种发展趋势，其特殊点就表现在这里。冯契由这种分析而认为伦理思想应兼顾理性的自觉与意志的自愿，就达到了一定的融合，这就深入了人的伦理思的分析。宏观比较的优点在于整体把握，避免烦琐论争，抓住重点，说明问题。诠释学的比较法，其实就是新实在论的逻分析方法。“智慧说”提出《墨经》中的“类”、“故”、“理”三个概念来勾画辩证思维的范畴体系，就达到澄清概念、勾通思想的目的。它认为“类”包括同一与差异，单一、特殊与一般，质与量，类和关系。认为“故”包括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根据与条件，实体和作用，质料、内容和形式，动力因和目的因。认为“理”包括现实、可能和规律，必然、偶然和或然，目的、手段和规则，必然、当然和自由。这种诠释学的比较是用人的认识辩证过程去理解这三个概念，“类”是现象的观察，“故”是现象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理”是总体的把握，这是用西方哲学的成果来梳理和阐发中国哲学思想（参见尹大贻：《智慧说——世纪之交的哲学体系》，《理论方法德性》，第106—107页）。我很赞成这一看法；因为他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冯契比较法的真实意义。冯契拿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主要是为了具体地揭示和澄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学说中的内在理论意蕴，彰显其丰富、深邃的内容，使之取得能够与其他哲学对话的形态，并真正融入世界哲学。这可以从他对中西伦理学思想所作的比较看得非常清楚。特别要指出的是，冯契作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新哲学。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都积累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源头，具有建构功能，只要善于比较和会通，就能够建构一个融入于世界哲学的新体系。他的“智慧说”的主干，即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相统一的学说，就是王夫之的天与人交互作用的观点、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原理、金岳霖的“以得自于经验之道还治于经验之身”的命题以及康德、黑格尔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经过比较会通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上述思维成果的比较和会通，也就没有冯契的智慧学说。

冯契提出的第二个方法，可谓是“通变法”。“通变”，是“通古今之变”的简称。它在我国已成为一种优秀传统，所以，冯契非常重视它，并自觉地运用它来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冯契认为，“通变法”大体包括“批判、会通、创新”等环节。应当看到，“通变”既是提升正价值的方法，也是辨别传统的精华与糟粕的方法。“因为传统本来是精华与糟粕混杂的库藏”，“真正要继承传统，必须经过分析批判”。但是，仅有一般的分析批判是不够的，还要善于作自我批判和系统的反思。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民主的作风、宽容的精神和超越自我的要求。正如冯契所说：“如果到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能达到自我批判阶段，进行系统的反思，克服种种盲目性，那便可能在总体上经过‘批判、会通、创新’的环节而取

得新面貌，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的探索》，第 561 页）又说：“如果在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能作自我批判和系统的反思，进而会通古今中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那么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传统也会给人以新的魅力，促使人们对传统哲学中隐藏的智慧作深层的挖掘。现代人要凭借传统来创造，而传统也因为人的创新而焕发青春。当中国现代哲学发扬其民族特色而成为世界哲学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智慧的探索》，第 563 页）

冯契提出的第三个方法，是“中介法”；这是我生造出来的名词，意思是当代人继承古代哲学要以近代哲学传统为中介。因为“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 1840 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 20 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同上书，第 557 页。）。只要回顾一下前面说过的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原理和金岳霖的“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观点，是从王夫之的天人交互作的学说说到冯契的“智慧说”的中介，就会深信冯契提出的“中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

冯契提出的第四个方法，可以概括为“扬长弃短法”。就是冯契说的“既要克服民族局限性，又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冯契文集》，第 9 卷，第 565 页）冯契在《智慧的民族特征——从中国传统哲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局限性，作了如下的概括：“求真——善于辩证思维与冷落形式逻辑”；“明善——高扬自觉原则与漠视自愿原则”；“审美——艺术意境理论的早熟和典型性格理论的晚出”。这些概括，是符合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的；我们要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关于“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冯契还特别指出，要着眼于“两个问题：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正是这两个问题，将能使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趋于合流。”（《冯契文集》，第 10 卷，第 228 页）这是广义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优点；发扬这两大优点，并使之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相沟通，中国哲学就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如何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哲学家的队伍，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哲学家是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的创造者，而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既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也灌注了哲学家的个性性格。更确切地说，哲学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世界精神是透过哲学家的个性和个人的真切感受表现出来的。既是如此，那么，在 21 世纪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当然是哲学家的队伍问题。21 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品格呢？我想用冯契的两段话来回答。一段话是：“首先要有理论兴趣，或哲学兴趣。……其次要把哲学理论化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方法才行，哲学也不例外，要是有所区别的话，也只能说哲学家在方法论上要有更大的自觉性。……最后，哲学家还要把理论化为德性。这首先是指哲学家要言行一致……但‘理论化为德性’还有另一层意思，是要使哲学理论具有个性，体现哲学家本人的情感、趣味和理想。哲学如果千人一面，那一定有许多不真诚的东西在里面，因为哲学家是活生生的人，而活生生的人是各有各的个性的。一种没有个性、因而不真诚的哲学，至少是没有吸引力、说服力的。我经常讲，21 世纪哲学将是真正的世界性的哲学。但这种世界性的哲学也应当同时是民族化的和个性化的。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贡献。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做成‘大’哲学家，我们也可以、甚至必须做一个‘好’哲学家——一个勤奋、真诚并且具有责任心的哲学家。”（《冯契文集》，第 9 卷，第 567 页）另一段话是：“从中国近代来说，一直在讨论古今中西问题，中西哲学有合流成为世界统一哲学的潮流。但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好做。比如许多世界第一流哲学家的全集都没有翻译过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像唐代玄奘那样把大量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过来。唐朝之所以能把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合流成中国

的佛经，与唐玄奘的工作有关。中西哲学合流的工作很可能要中国人来做。搞哲学的人当然要关心改革、开放，但不要纠缠于枝枝节节，而要注意一些大的问题。”（《冯契文集》，第10卷，第262—263页）这是一段意味深长而又富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话。它向我们预言：中国将要成为中西哲学合流、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它期待着唐玄奘式的哲学家的出现；也希望年轻的哲学工作者中，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具有智慧头脑的哲学家。我们深信冯契先生的预言和期待是一定会变成现实的。

On the Idea of World Philosophy of Fengqi

Zangho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paper made a general and deep discussion about the Idea of world philosophy of Fengqi. It includes four issues: Firstly, the meaning of World Philosophy, he thought that World Philosophy mainly show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cour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different national philosophy. Secondly, the beginning of world philosophy, he considered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was the symbol of world philosophy. Thirdly, the Idea of World Philosophy in his theory of wisdom, he believed that the theory of wisdom was a example of the process of forming World Philosophy. Last, how to push the forming and improvement of World Philosophy, he emphasized that correct attitude, fit method ,and a elegant group of philosopher can made Chinese philosophy of 21C take the way to the world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philosophy.

Key words: Fengqi; Hushi; Concour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orld Philosophy

收稿日期: 2006-6-4

作者简介: 臧宏, 男, 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